

西南边疆治理视域下湘西军政地位的提升及建置 ——以明代“镇筸”为中心

周妮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镇筸”之名为“镇”“筸”二字合称。其最早出现并使用,始于正德八年镇筸守备的设置。镇筸所在的湘西地区自先秦时期即设黔中郡管辖,为秦楚两国争夺的重点区域,是楚国西拓云贵的要隘,区位优势明显。在唐代,镇筸属黔中道,为连接唐朝“内地”与“边疆”(剑南道、岭南道)的重要地带。在宋代,镇筸是与“省地”交界的羁縻(边缘)地区,广泛设置寨堡进行系统化军事管理,开启区域治理的新篇章。元明时期,保靖州与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的设置,使区域高级政区建置发生改变,达到峰值。尤其在明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历史地理大背景下,镇筸所在的湘西地区成为连接“内地”与“西南边疆”的重要通道,战略价值进一步提升。为维护这一通道,保障西南边疆治理所需人力、物力、财力的供给,湘西成为“西南战略”的重要部分,镇筸成为区域治理的“重中之重”,先后在该地置镇筸守备、镇筸参将。至嘉靖时期,湖广总督在沅州的设置,更使区域管理及防御等级上升到最高层次。

关键词:明代;湘西;镇筸;西南边疆治理

中图分类号:K248;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5)06-0194-11

历史时期的湘西军政问题^①已为学术界广泛关注^②。然而,既有讨论多“就区域而论区域”,未深入探讨湘西地区军政建置与王朝国家西南边疆治理间的互动关系^③。与之相关的西南边疆治理研究,虽多将湘西地区纳入其中,但因湘西并非直接的边疆地带,亦较少涉及这一方面的讨论^④。“镇筸”作为湘西的军事重镇,其名称的形成与沿用集中反映了明清朝廷对湘西的军事控扼与行政整合进程,是观察该地区军政建置的重要窗口。叶德政先生根据《凤凰厅志》等的记载,将“镇筸”名称的出现与沿用时间限定在清代的242年^[1],并以此来判断镇筸地区在历史时期的军政地位,是值得商榷与讨论的^⑤。鉴于此,笔者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湘西置于王朝国家西南边疆治理的整体战略下,以“镇筸”为中心,对镇筸所在湘西地区历史地位的演变与军政建置的变迁进行解析,以揭示湘西地区作为“内地—边疆”通道的枢纽作用,深化历史时期西南边疆治理方略的系统认知,以乞正于方家。

一、从古黔中到镇筸守备:湘西辰沅地区的军政建置

两湖地区环绕云梦泽,纵贯长江,西界武陵,地理环境复杂,东西差异突出。地处武陵山地的湖南西部地区为少数民族先民聚居地,区域内社会矛盾与冲突自秦汉至清时期较为突出。因此,在民族

收稿日期:2024-05-24;修回日期:2025-04-07

基金项目: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土司历史地理考释与地图集编绘”(23&ZD260)

作者简介:周妮,女,重庆彭水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边疆学、历史人文地理、西南民族史,

联系邮箱:20210151@ynu.edu.cn

结构与山川地域结构均极为复杂的情况下，湘西地区的历史演变也较为曲折，军事与行政建置相交织的特点非常突出。

(一) 明及明以前湘西地区的政区建置

自先秦至明末，湘西地区的政区建置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先秦至唐宋时期，是政区建置初创或草创时代，稳定性较差；第二阶段自元明时期开始，进入土司时代。

先秦时期，湘西地区属楚国“黔中之地”，置黔中郡进行管理，苏秦曾称赞楚国“西有黔中、巫郡”^{[2](2260)}。但关于楚国黔中郡的方位，很早就存在着不同观点^⑥。一种观点认为楚黔中郡在武陵(今常德市武陵区)，即《史记集解》引徐广之言曰：“今之武陵也。”^{[2](2259)}另一种观点认为楚黔中郡在辰州(今怀化市沅陵县)。如《史记正义》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盘瓠后也。”^{[2](2559)}《括地志》亦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也。”^{[2](216)}《后汉书·南蛮传》也称：“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李贤注曰：“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县西。”^[3]唐代李吉甫深入考订，曰：

其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汉改黔中为武陵郡，移理义陵，即今辰州叙(淑)浦县是，后魏移理临沅，即今辰州是。今辰、锦、叙、奖、溪、澧、朗、施等州，实秦、汉黔中郡之地。^[4]

显然，李吉甫认为先秦时期黔中郡的核心在湘西地区，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仍在其地置黔中郡，成为“三十六郡”之一^{[2](239-240)}。两汉时期，在秦黔中郡基础上，置武陵郡(治今常德市)，管辖充县(今桑植县)、零阳(今慈利县)、沅陵(今沅陵县)、酉阳(今永顺、保靖、古丈三县之间)、迁陵(今保靖县)、辰阳(今辰溪县)、义陵(今淑浦县)、无阳(今芷江侗族自治县)、鐔成(今靖州南)等县。三国时期，湘西地区为孙吴政权辖域，仍置武陵郡，较之两汉时期无明显变化。

自南北朝后期至隋唐，中原王朝在湘西地区细化政区设置，建置较高等级的政区。隋代，湘西地区政区建置由原来的武陵一郡，改置为武陵、沅陵二郡，且武陵郡仅辖武陵、龙阳二县，不再管辖今湘西自治州、怀化市所在的湘西地区，管辖范围较之前大为缩小。湘西独立设置一个政区，政区级别明显提高。以沅陵郡为例，“开皇九年(589)，置辰州”^[5]，治沅陵县，与武陵郡为同级政区。

唐代，湘西地区的行政区划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

辰州，下。隋沅陵县。武德四年(621)，平萧铣，置辰州，领沅陵等五县。九年(626)，分大乡置大乡五县。(贞观)五年(631)，分辰溪置淑浦县。贞观九年(635)，分大乡置三亭县。天授二年(691)，分大乡、三亭两县置溪州。景云二年(711)，置都督府，督巫、业、锦三州。^{[6](1621)}

锦州，下。垂拱二年(686)，分辰州麻阳县地并开山洞置锦州及四县。……洛浦，天授二年，分辰州之大乡置。属溪州。长安四年，改属锦州。^{[6](1622)}

巫州，下。贞观八年(634)，分辰州龙标县置巫州。其年，置夜郎、朗溪、思征三县。九年，废思征县。天授二年，改为沅州，分夜郎渭溪县。长安三年(703)，割夜郎、渭溪二县置舞州。先天二年(713)，又置潭阳县。开元十三年(725)，改沅州为巫州。^{[6](1623)}

溪州，下。旧辰州之大乡。天授二年，分置溪州。旧领县二，又分置洛浦县。长安四年，以洛浦属锦州。天宝元年(742)，改溪州为灵溪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溪州。领县二……大乡，汉沅陵、迁陵二县地，属武陵郡。梁分置大乡县。旧属辰州，天授二年来属，州所理也。三亭，贞观九年，分大乡置，属辰州。天授二年，改属溪州。县界有黔山，大酉、小酉二山。^{[6](1628-1629)}

可见，随着区域治理的深入与地方认知的加强，原置政区已无法满足地方治理需求，不得不进行新的调整。将原大乡县分为三个部分，置大乡县、三亭县与洛浦县，并以大乡、三亭二县为基础，单

独设置与辰州同级的溪州进行管理;分龙标县地,设置与辰州同级的州级政区巫州;从辰溪县分出部分区域,设置与其同级的溆浦县;从麻阳县分出部分区域,与新开辟区域组成新的州级政区锦州,使原来仅设一州进行管理的区域,逐渐分化为四州十余县,州郡级政区由隋朝的沅陵一郡(州)增置为溪、辰、锦、巫、业五州(郡),完成湘西地区政区的重大升级。

然而,唐代湘西地区所置郡,如卢溪郡、潭阳郡、龙标郡、卢阳郡等,均曾为“蛮夷”聚居之地。虽唐朝廷根据治理需要,将江南道一分为三,专设黔中道管理湘西所在的今湘鄂渝黔交界区域,但治理与管理程度远不及唐朝内地,直接纳入户籍管理的人口也远少于江南东道、江南西道所辖各郡县,不少区域仍处于“化外”状态^⑦。因此,唐代末期伴随唐朝廷的衰落,这一地区又脱离朝廷控制,为地方少数民族管理与治理。至五代十国时期,此地多为地方势力割据。北宋建立后,以地方大族为基础,在其地置溪州、永顺州、保靖州等羁縻州进行管理,湘西地区成为与“省地”交界的“羁縻区域”。两宋为防御羁縻州非汉族群侵犯“省地”,开始在湘西地区进行有体系的军事布防与建设。

至元代,元朝廷在湘西地区废除羁縻州,改置沿边溪峒招讨司、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继元之后,明代湘西地区行政区划又一次发生较大变化,所置政区级别再次得到提升。一方面,在元代所设宣抚司、安抚司的基础上,升永顺、保靖为宣慰司。《明史·湖广土司列传》称:“保靖,唐溪州地,宋置保靖州,元为保靖州安抚司。明太祖之初起也,安抚使彭世雄率其属归附,命仍为保靖安抚使。洪武元年(1368),保靖安抚使彭万里遣子德胜奉表贡马及方物,诏升安抚司为保靖宣慰司,以万里为之,隶湖广都指挥使司。自是,朝贡如制。”又载:“初,保靖安抚彭万里以洪武元年归附,即其地设保靖宣慰司,授万里宣慰使,领白崖、大别、大江、小江等二十八村寨。”^{[7](7995-7996)}又置上溪、南渭、施溶等土州与桑植安抚司、腊惹洞、麦着黄洞、驴迟洞、施溶溪、白崖峒、田家洞、五寨、篁子坪等长官司共同管理地方非汉族群,湘西地区进入土司管理时代。另一方面,将湘西“辰、沅之地”升为“沅州府”与“辰州府”府级行政单位,提高土司周边地区的行政区划级别。然而,土司在地方“恣意妄为,欺小凌弱,任意扩张,侵夺邻境”^[8],湘西地方治理面临新的困境,军事战略布局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

(二) 宋明时期湘西地区的军事建置

宋朝虽在湘西地区置羁縻州,但其地“人多劲悍忿决,勇于私斗”,且“羁縻州县,岁时修贡,间侵边境”^[9],地方并不稳定。基于此,宋朝廷在湘西地区广置寨堡,进行系统化的军事布局与管理,开启区域治理的新篇章。与湘西地区发展关系密切的镇溪寨即始见于宋代。

镇溪,原为溪州属地,唐末五代时期“诸酋分据之地”^{[10](441)}。后晋天福五年(940),地方首领彭士愁等率众进攻澧州(治今湖南澧县),双方相持不下,最终结盟,立柱为誓,授彭士愁溪州刺史之职。宋初,受多方因素影响,宋朝廷多次拒绝湘西地区羁縻州刺史“纳疆土”“交赋税”的请求。但湘西诸部纷争,终究不利于地方治理。宋朝廷改变地方治理策略,通过设置兼具军事与行政职能的寨堡管理地方,如地处湘西的溪州“各以其地归版籍”后,师晏即“降诏修筑下溪州城,并置寨于茶滩南岸,赐新城名会溪,新寨名黔安,戍以兵,隶辰州,出租赋如汉民”^[11]。后“因辰州以闻,于是朝廷命师晏袭知下溪州事,其所赐予之甚厚,诏以所归地为镇溪寨”^{[10](442)}。镇溪寨在今吉首市内,既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置最早的军寨,也是宋代两湖西部地区开发及建置历史上的一个突破。而有宋一代,宋朝廷在与湘西地区羁縻州交涉过程中,先后设置三十三个寨(堡),兼管地方军事与民事,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寨堡治理体系^{[12](157-175)}。

明朝建立后,在原羁縻州集中的湘西地区置土司进行管理。然而,“土司既是明朝廷治理湘鄂山区的主要力量,又是需要加强控制的地方势力”^{[12](54)}。明朝廷在利用土司管理地方的同时,不得不完

善湘西地区的军事建置，在湘西及其周边设置岳州卫、永定卫、九溪卫、澧州千户所、大庸千户所、添平千户所、安福千户所、麻寮千户所，建立以“湘西”为中心的卫所体系，控扼地方，威慑土司。嘉靖三十年(1551)，设九永守备，“驻扎九溪地方，管辖施州卫，统领永定、九溪、大庸、麻寮、添平、安福等卫所，防制永顺、容美诸夷”^[13]。除卫所外，明朝廷还在湘西地区置巡检司，如严如煜言“辰州府所属沅陵县东北有池蓬巡检，又有高岩巡检；泸溪县南有溪峒，西有河溪，西南有县场坪；辰溪县东有渡口镇，南有浦市镇；溆浦县南有龙潭，东北有镇宁；沅州西有晃州，西南有西关渡口；黔阳县东有安江；麻阳县东北有岩门。各置一巡检，统十六巡检司。至是立弓兵，平居训练，遇警调发，给以行粮。”^[14]其中，与湘西土司相邻各县的巡检司基本位于该县与土司交界区域，既承担巡检司的一般职责，又有防御土司及其所辖土民入侵的职责。镇溪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凸显，先后设置巡检司与千户所。

镇溪巡检司在“(辰州)府西三百里”^[15]，“宋于此置寨”^{[16](2880)}，洪武十二年(1379)置巡检司，属辰州府管辖^{[17](1983)}。后因“辰州卢溪县主簿孙应隆招谕蛮民复业者多”^{[17](3618)}，巡检司不能满足地方治理需要，改置镇溪千户所，“以镇崇山、沿场、高岩等处，分蛮长石答冲等百四十二寨，隶辰州卫”^{[16](2880)}。除已经招谕归附的“蛮民”外，其周边地区还分布着数量较多的“生苗”。与之邻近的箐子坪长官司即为永乐三年(1405)“辰州卫指挥金事龚能等招谕箐子(坪)等处三十五寨生苗龙廖彪等四百五十三户向化”^{[18](689)}后所置。但箐子坪长官司设置后，该地仍不时发生叛乱。永乐十二年(1414)，箐子坪吴者泥等“自称苗王，纠率蛮民苗金龙、苗阿甲等，及亡命军民、民，出没为寇，攻劫屯寨”^{[18](1789)}。宣德七年(1432)二月，又有“湖广所属箐子坪梗化生苗累肆劫掠铜仁、乌罗等府及五寨等长官司，民被其害，不能安业”^{[19](2015)}的记载。三月，治古答意长官司苗人吴不尔等又“遁入箐子坪，结生苗龙不登等，及纠合镇溪梢里顺苗贼众，攻劫湖广五寨长官司、民寨白崖等处，为患滋甚”^{[19](2030-2031)}。镇溪因与箐子坪相邻，参与叛乱，成为明朝廷重点治理区域，发展成为“镇筵守备”区。

按《明实录》记载，“镇”“筵”两字合称，最早出现于明正德五年(1510)，明朝廷“免贵州铜仁、石阡、思南、思州四府、婺川、印江二县正官朝觐。时湖广镇(、)筵等处苗贼为乱，铜仁等府县与之密迩故也”^{[20](1430)}。此中“镇(、)筵”即为镇溪、箐子坪之合称，泛指与铜仁、石阡、思南、思州四府相邻的、镇溪与箐子坪之间的苗民聚居区域。因“镇(、)筵等处苗贼为乱”，反叛事态频发，人们甚至将“镇(、)筵”作为一种特殊族群，称“西南夷曰镇溪、箐子坪，邛僰裔也”^[21]。可见，当时所言“镇筵”并非单独的地名，是因为镇溪千户所与箐子坪长官司两地所管辖地域相连，且都有严重的叛乱问题，因而被置于一处简称。

据文献记载及资料相互印证，“镇”“筵”两字完全合并为一词，始于正德八年(1513)，“以辰州卫指挥、同知王爵守备镇筵地方”^{[20](2061)}，“镇筵守备”正式设置，“镇筵地方”成为一个有军事主管官员的地方守备(镇戍)区。《明史·职官志》称：“凡镇戍将校五等，曰镇守，曰协守，曰分守，曰守备，曰备倭。皆因事增置，视地险要，设兵屯戍之。”^{[7](1753)}镇筵守备区在明代是“因事增置”。但实际上，其长期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如明代著名学者罗洪先的《赠镇筵守备李将军》一诗云：

武略重边营，兵符出禁城。将星三楚动，杀气九溪横。

鱼鸟开行阵，蛮夷服耦耕。会须靖南服，重见拜西平。^[22]

可见，“镇筵”之名的存在，最早应从正德八年(1513)镇筵守备出现算起，而不是清代康熙三十九年(1700)^[1]。值得注意的是，镇筵名称的始置及沿用，并非简单的时间长短问题，还涉及湘西镇筵之地的历史地位。为何从明朝初年开始，镇筵之地备受关注，且长期被设置为守备区？笔者以为，除湘西地区在当时存在严重的地方叛乱外，镇筵之地的重要与否，还与明朝的西南边疆治理方

略密切相关。

二、西通滇、黔：明朝西南治理背景下湘西镇筴的崛起

先秦时期,镇筴所在的湘西地区属于“黔中”,地处楚国南部,是东西交通往来的枢纽,战略地位显要,关系楚国国运兴衰。《战国策·楚策》记载苏秦、张仪在合纵、连横游说楚威王的过程中均反复提到楚国黔中郡,认为“对于秦国而言,攻下黔中郡,是其能否顺利吞并楚国的关键,意义重大。对于楚国而言,能否守住黔中郡,是其能否继续维持政权的关键,意义也十分重大”^[23]。正因其战略位置重要,秦、楚两国曾就“黔中之地”展开长期争夺。楚威王时,楚国为应对秦国的进攻,“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然而,在庄蹻发现滇国价值,欲归楚之时,“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2](2993)}亦说明“黔中”正当楚国西拓云贵的要害,其战略价值在当时已初步显现。因此,祝穆称其“为楚西南徼道”^{[24](1055)},并引《郡志》云:

在昔,黔中为楚之南宇,左包洞庭之险,右控五溪之要。秦以虎狼之威,志在吞楚,而必欲得楚之黔中,故楚由是衰。武陵,实黔中郡也。^{[24](534)}

秦统一六国后,在湘西地区延续黔中郡的设置,但所辖范围较之先秦时期已大为缩小。两汉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改设武陵郡,为“武陵蛮”“五溪蛮”聚居区域。至唐代,湘西地区纳入黔中道管辖,与黔中道其他区域一起,成为连接唐朝“内地”与“边疆”(剑南道、岭南道)的重要地带。宋代,又为连接直辖郡县的羁縻州集中区域,“为省地与蛮(蕃)地双方分界的界至”^[25],是朝廷重点治理,却又“力不从心”,未能实现有效治理的“边缘”之地。

至元代,元朝疆域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⑧虽有夸饰之意,却突出了元朝在疆域建设及管理制度上的重要贡献。这一贡献包括改变三国两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西南格局,结束南中大姓及南诏、大理政权对云南的控制,使云南成为元朝廷进一步向南拓展的据点及西南边疆治理的重点。湘西作为连接云南的重要通道,在元朝经营云南的过程中亦受到高度重视,增置驿站,开通驿路,发展为“湖广到云南最为重要的通道”^⑨。

然而,西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元朝廷未能如愿在西南边疆全面建立与内地相同的治理体系,最终将此难题留给了明朝。对于明朝廷而言,西南治理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仍然是地处遥远边疆的云南的治理。明代学者章潢曰:“若滇则孤悬万里,恃中国以为声援。其地辽阔广远,实东则西虚,南顾则北单弱。不患无地,而患无人以守,外有窥伺之虞……”^{[26](885)}明确指出距离之遥远与交通之阻隔艰难,是影响云南治理与安全的最大难题。如遇外敌袭扰或侵占,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又言:

然执事之间,若有隐忧然者,何也?为滇人之虑远也,且执事所谓纡迟驿递则病于官,绰远侵掠则病于民,是固然矣。然又有甚者。夫中原之人入滇,其道里自西至者,上荆门,涉泸水,登陆陟乌撒。自南至者,溯流上郴、桂,泛洞庭巨浸,又数千里,始达沅州。攀缘关岭,其鸟道盘郁,苗夷出没四旁,于危磴中垒土筑堡,凭高瞭远,昼析宵钲,日晏启闭,游徼之兵负弩尾蹶,而后敢启行。士旅往来,若履虎尾而蹈春冰……^{[26](886)}

除真切描述入滇道路的艰险外,还指出当时由中原地区前往云南最主要的两条路线。其中一条即为自湖南郴州、桂阳州,至洞庭湖,然后再到沅州,从沅州进入贵州,经贵州“一线道”至云南。可见,湘西辰沅地区在自南入滇的路途中十分关键。

又有研究者指出：“贵州的创置，是明代推进西南区域治理的重大举措。”^⑧按《明史·地理志》曰：“贵州，《禹贡》荆、梁二州徼外，元为湖广、四川、云南三行中书省地。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7](1197)}明代新设贵州行省是由元代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分置而来，其建置对云南的安危至关重要，“大抵贵州开为云南，无贵州是无云南也”^[27]。因此，贵州的交通建设问题一度被列为明代西南治理方略中的头等大事，正如《图书编》卷四二《控制云南》篇曰：

独云南界在万里外，孤悬一隅。其所通之道，特借贵州九驿，以为往来。万一中阻，则彼此悬隔邻邦，军旅虽众且强，而救援无可通之途，势可隐忧，莫此为亟也。^{[26](887)}

明代朱之蕃亦在《(沅州)修龙津桥记》中曰：沅州“据楚上游，滇南、贵州之往来其途，若门户之必由……”^⑨道出湘西在云贵交通上的重要性^⑩。镇筸之地位于沅州、辰州之北、西，既是非汉族聚居地，又是土司政区与经制州县间的过渡地带，其地稳定与否是影响湖广至云贵交通(沅州、辰州段)畅通与否的关键，战略价值明显。如明人萧端蒙指出：

故贵州之壤土，大率与三省之地相错揉。自今言之，西则四川乌蒙、芒部诸郡，南则广之泗城、云之曲靖，东则湖广辰、沅、镇筸等处，北则播州、邑、茶诸酋，其土田则错畎也，其寨落则错置也，其夷民则错处也，所谓‘犬牙相制’之国也。^{[28](27)}

章潢也指出：“楚之边有三，曰靖州，曰清浪，曰镇筸，而镇筸之地为要。此无他，以川、贵相株连，而且当麻阳之出没也。”^{[26](823)}故而《明史·湖广土司列传》称：“湖南，古巫郡、黔中地也，其施州卫与永、保诸土司境，介于岳、辰、常德之西，与川东巴、夔相接壤，南通黔阳。溪峒深阻，易于寇盗……”^{[7](7982)}明确指出镇筸之地的的重要性及存在的治理难题。地处沅州北面的麻阳，作为介于镇筸与通滇驿道之间的经制县，“东有包茅山，西有蜡(腊)尔山，与保靖司及四川、贵州界。诸苗蛮在山下者，凡七十四寨，南有辰水，自贵州铜仁府流入，西有锦水下流，入于辰州”^{[7](1093)}。独特的地理环境已然为区域治理造成困难，镇筸地区独特而复杂的地貌形态与民族构成，更成为区域间交通障碍，不时爆发的地方叛乱大大增加了明朝统治者的焦虑，也对中原王朝与西南交通体系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

所言腊尔山，为明代湖南与贵州的重要界山，据《明通鉴》记载：“湖、贵间有山，曰蜡尔，诸苗居之。东属镇溪千户所、箬子坪长官司，隶湖广；西属铜仁、平头二长官司，隶贵州；北接四川酉阳，广袤数百里，诸苗数反，官兵不能制……”^[29]腊尔山是镇筸所在区域的重要地理标志与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叛乱频发的地区。如明代名臣桂萼在《贵州图叙》中指出：“若思南、石阡、铜仁数郡，界在镇筸(镇远、箬子坪，俱长官司，隶湖广)，西播(酉阳宣抚司、播州宣慰司，俱隶四川)夷峒之间，鸱张豕突(诸夷常突出数郡寇掠)，貽患实深。”^⑪正因湘西镇筸之地与贵州相邻接，宣德五年(1430)，贵州乌罗府境内治古、答意二长官司长官与湘西箬子坪长官吴毕郎等共同作乱，难以招抚。知府严律已提出：“缘其地与镇溪、酉阳诸蛮接境，恐相煽为乱，请调官土军分据要地，绝其粮道，且捕且抚，事平之后，宜置卫所巡司以守之。”^{[7](8181)}事后，地方官府修筑二十四堡，环绕苗地。推官侯加地在《各哨所总说》中曰：

镇筸西北有溪，曰镇；东北有坪，曰箬子，故统括曰镇筸云。其五寨则主将驻扎地。迤而北则长宁、箭塘、盛华、永安、永宁、凤凰、王会；迤而东则清溪、靖江、洞口、箬子，转而之东北，则乾州、强虎，转而之西，则石羊、小坡。其他小营堡各附其地，而以镇溪所终焉。辖地广袤八百余里，东距泸溪，南抵麻阳，西接乌罗，北连永、保。东南一百里界乎辰溪，东北二百里界乎沅陵，西北三百里界乎蜀之酉阳、石耶、邑梅，西南一百五十里界乎黔之铜仁。其中苗僚杂处，种类甚繁，边民屡遭劫掠。各哨惟图自保，不相救援，非所以安边也。^[30]

侯加地在对镇筸部署进行全面描述的同时，也对治理困难的症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湘西镇

算地区频繁发生叛乱的重要原因是明朝守军之间互不统属,事权不一,唯求自保。

正德年间,“镇算、五寨、平头、乌龙(罗)等处苗贼龙童保、龙麻阳等构乱,岁久”,经“湖广、贵州镇巡官调汉土官军”,“都御史沈林、总兵李旻率都指挥张泰等分四路”进攻,“破其巢,擒童保等六十余人,俘斩又千余人,孟溪等九十七寨皆降”。取得胜利后,湖广、贵州镇巡官不得不“以夷性变诈”,“请添设守备官”守备镇算地方。明朝廷意识到添设守备管理镇算之地的重要性,同意添设守备官,“以辰州卫指挥同知王爵守备镇算地方”^{[20](2061)}。显然,镇算之地的叛乱事件直接促成了镇算守备的建立。

后因地方治理需要,改镇算守备为参将,镇算之地的防守等级进一步提升。如明朝著名将领俞大猷亦曾在“镇算有警”^{[7](5605)}之时,应川湖总督黄光升推荐,担任镇算参将。

因镇算区位价值的特殊性,镇算参将作为管理镇算之地的主要官员,其所管区域不限于镇算之地。嘉靖二十三年(1544)五月,都御史万镗鉴于当时治安情况复杂,在《善后事宜七事》中特别建议扩充参将权限范围,曰“参将既设在湖广,则常德等六卫、永顺等宣慰、施南等宣抚、箐子坪等长官司及镇算、九永二守备隶焉。在贵州则铜仁等长官司守备,他如四川西阳宣抚、平茶、邑梅等长官司皆隶焉,有司不得阻挠行事”^{[31](5534-5535)}。万历十一年(1583),又根据湖广巡按李江等人题奏:“永顺、保靖二司原隶镇算参将,因未载敕书,以致事权未重,威令难行”,“将二司并荆瞿守备、施州卫、施南等宣抚司各官照旧听镇算参将节制,载入敕书,其永安、强虎、箐子、洞口、镇溪所、乾州等哨舍把,俱用土官亲枝,听参将选委防御”^{[32](2566)}。可见,镇算参将设置后,其权力在逐步扩大与提升。

嘉靖年间,镇算地区“有蜡尔山苗之乱,又有箐子坪土官田兴爵之乱”^[33],因地方官事权有限,守将及地方官的镇压接连遭遇失败,反叛势力一时难以平息,地方官员要求朝廷派遣重臣弹压。嘉靖二十六年(1547)闰九月辛卯,巡按湖广贵州御史贾大亨、萧端蒙各言:“铜仁、镇算叛苗未平,二省抚镇官讨贼不力,动相咎让,事机相左,大有可虞。”以“四川西阳实镇算、铜仁后门,今止责成湖广,不及四川,则苗易遁窜,师将罔功”。提出“窃计征苗,非合三省力不可,欲合三省力,非设总督重臣不济”^{[31](6043-6044)}的建议。虽然朝廷最初认为“总督官不必增设”,但还是因其地叛乱频发且波及三省,形势危急,“乃命(张)岳总督湖广、贵州、四川军务,讨之”^{[7](5297)}。明代湖广总督的设置自此开始,如明人雷礼在《列卿纪》中言:“湖广自辰、沅一带,通贵州、川东。自嘉靖二十七年(1548),湖之麻阳、镇算、贵之铜仁诸苗叛,始设总督军务大臣,节制三省。”^[34]

显然,明嘉靖年间湖广总督之设,专为应对湘西及镇算、铜仁等地的地方叛乱,是湘西及镇算地区战略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但据清代《钦定历代职官表》曰:“韩雍总督两广(成化元年,1465),此为专设总督之始。若正统六年(1441)征麓川,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景泰元年(1450)讨叛苗,以巡抚河南副都御史王来总督湖广、贵州军务,俱在王翱为总督之先,然皆因事而设,非定制也。”^[35]说明早在景泰元年时,明朝廷为应对湖广、贵州地方的叛乱,已设置过总督,总督湖广、贵州军务,但并未成为专设总督,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均未见总督设置。因此,靳润成将之归为“暂设总督”^[36]。直至嘉靖年间,为应对镇算所在湘西及贵州铜仁等地的地方叛乱,又专设总督军务大臣,由张岳、冯岳、王崇、石勇、董威、罗崇奎等6人先后担任总督,驻沅州府,总督湖广、贵州、四川三省,甚至云南^{[37](355-358)}。

沅州府为“荆楚之余裔”,地处“辰、常之上游”。地域内“崇山深阻,蛮夷盘错。自洪武迄于嘉靖十六七年,铜仁、镇溪、箐坪诸苗出没无常……合湖广之力,环而攻之,数载绩用弗成”。因而“朝议始设重臣,督治蜀、黔、楚”,于是“开府于沅,沅州为特重矣”^{[38](652)}。曾任辰沅兵备道的明朝官员阮文中亦在《总督张公祠碑记》中言:“初,沅未有总镇,其时从贵州巡按臣请,添设重臣于沅,开府镇压,而公以右都院领是职,盖庙堂注意,独公能办之也。”^{[38](659)}湘西区域管理与防御等级上升到最高层次。直至万历二十七年(1599)之后,湖广总督为巡抚偏沅赞理军务所取代,“半年驻偏桥,半

年驻沅州”^{[37](360)}。

而伴随湖广总督在沅州的设置，湘西军政官员的规模与等级也得到提升。据《辰州府志》作者梳理：“明分守道驻辰州府城者四十二人，天启以后，似有缺略，无从查补。兵备道驻沅州者五十六人，外补十人，共六十六人。分巡道驻常德兼辖辰、沅者二十六人，外补十二人，共三十八人。总督八人，巡抚六人，外补一人，共七人，皆系驻沅州者……”^{[37](362)}如此众多的高层次军政官员驻扎于湘西地区，也反映出湘西地区战略地位之重要及治理难度之高。

同时，湘西地区驻防体系也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加强^①。嘉靖初年，“镇筸等处红苗叛乱讨平，设立乾州、五寨、洞口、靖疆、清溪、长宁等大小十八营哨，每哨兵卒或二三百名，或百名，委辰、沅等各卫指挥千百户督兵防御，又该参、守各一员统制弹压”^{[32](10434)}。嘉靖三十四年(1555)三月，以初设“分守镇筸参将一员驻扎麻阳，去乾州、五寨各越百里外”，“遥制之难”，且“苗情间作不靖，至是鸟牌寨苗龙、亚七等以仇执镇溪所千户宋钦”。明朝廷在湖广总督冯岳等人的建议下，将镇筸参将的驻地移往五寨长官司，并于“诸苗出入之冲”，“各立哨堡一座，分兵防守”^{[31](7287)}，以控制与治理地方。五寨长官司治所在今湘西凤凰县境，镇筸参将驻其地，可“东控镇筸、乾州，西援贵之铜、平，南捍辰、沅诸郡县”^[39]，亦突出了五寨长官司所在凤凰地区在湖南、贵州交界区域的军政重要性。

三、结语

历史时期西南边疆治理问题不能也无法孤立或分区域研究。明朝西南治理方略是一项整体性的战略举措，彼此联结，环环相扣，涉及中原及西南数省。近年来，“苗疆走廊”研究的兴起，事实上提出了一个重新思考西南边疆治理中整体性与关联性的问题。

作为连接“内地”与“边疆”的湘西地区，在历史上的西南治理方略中发挥着相当关键的作用。自先秦开始，它已显现出重要的战略价值。至唐代，为连接“内地”与“边疆”的重要地带。宋代，为邻近“省地”（“内地”）的边缘地带，开启体系化的军事布局，全面建寨屯兵，掀开了区域治理的新篇章。其时，镇溪寨与筸子坪见诸文献记载，为后来镇筸之雏形。至元代，疆域的拓展改变了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的西南格局，湘西作为中原王朝经略西南的重要通道，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但有元一代未能在西南边疆实现“内地一体化”，将西南边疆治理难题留给了明朝。

明朝建立后，朝廷在西南地区的大力开拓正是镇筸崛起的历史地理大背景。镇筸守备、镇筸参将乃至湖广总督的设置，均为直接佐证。湘西地区从明代开始，成为“苗疆”以及两湖(湖广)通往川、黔、滇地区的“咽喉”之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既为交通要道，地方不免受赋税及征役之苦，要道以西、以北的镇筸之地又为多民族混居区域，社会矛盾突出，是影响湘黔滇通道(亦称“苗疆走廊”或“一线道”)的关键因素，因而成为区域治理的“重中之重”。在每一阶段的大规模叛乱被镇压之后，明朝廷便适时提高镇筸地区的管理与防御等级。正德年间，形成镇筸守备联区，置守备官，守备镇筸。后又根据地方治理需要，升级为镇筸参将，镇筸参将成为镇筸及其周边地区军事管理的高级指挥。嘉靖年间，镇筸总兵官移驻与湖广总督的创置，使这一地区的管理及防御等级上升到最高层次，呈现出西南边疆治理整体视域下中间连接地带(湘西)区域治理的重要性。

注释：

① 本文所指“湘西地区”包括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怀化市。所言西南边疆治理侧重于政治、军事方面，认为湘西的政治、军事治理策略与布局是西南边疆治理整体战略的重要部分。

- ② 笔者在拙著《山川纵横：宋至清时期湘鄂山区政区与军事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24年)“关于湘鄂山区政区与军事地理问题的研究”中(第4—13页)，对区域内军政问题已有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此不再赘述。
- ③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贵州、湘西的研究已提出贵州、湘西这一类中间连接地带与边疆治理间的关系，只是限于研究重点的不同，未进一步深入探讨西南边疆治理视域下湘西地方的军政建置问题(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谢晓辉《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张应强《边墙的兴废与明清苗疆社会》，《中山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74—81页)。此外，瞿州莲、瞿宏州亦指出湘西在清代康熙朝边疆治理中的重要性，认为康熙时期湘西治理政策的调整是服务于整个西南战略的(参见《论康熙时期治理湘西的政策调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 ④ 以历史时期“西南边疆治理”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成果主要有：方铁、方慧的《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罗彩娟、徐杰舜、罗树杰：《中国西南边疆治理模式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孙宏年：《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成臻铭：《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杨福泉主编：《中国西南文化研究·西南边疆治理专辑》，云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等。其中，方铁、孙宏年均指出，元明时期由湖南至贵州再至云南的驿道是连接“内地”与“边疆”的重要通道，推动了边疆治理与边疆开发，但未涉及其对地方的影响。罗彩娟等人以现代意义上的边疆为标准，探讨以广西、云南、西藏为中心的西南边疆治理，未涉及湖广。杨福泉主编的《中国西南文化研究·西南边疆治理专辑》仅收录云南相关文章，亦未涉及湖广。明代西南边疆治理研究则未见系统论述，一方面包含于以上总体研究中，另一方面也散见于具体研究中，但未涉及本文所关注的“内地”与“边疆”之中间连接地带与西南边疆治理关系问题的专门研究。如覃远东：《明代西南边疆军屯的作用和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冯刚：《靖难之役与西南边疆安全研究》，大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5月；罗勇：《明代西南边疆经略中的粮饷供应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陈盈诺、霍维洮：《从茶马贸易看明代西南边疆治理》，《民族学论丛》2024年第4期。
- ⑤ 张伟然曾在研究中指出，“镇”“箦”二地牵合在一起始于明正德八年“镇箦守备”的设置(参见《“镇箦”出“凤凰”》，载黄友爱主编：《湘水》第3辑，岳麓书社，2016年，第28—40页)。
- ⑥ 关于“黔中郡”方位及辖域等，笔者在《政区与区域之间：“黔中”名实变迁考》(《贵州文史丛刊》2022年第2期)一文及《涪沅之间：唐代黔中道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25年)一书中有全面的考证，在此仅列举文献中存在的两种看法，不展开学界关于其研究的具体讨论。
- ⑦ 此处“蛮夷”“化外”为历史文献对历史时期区域内非汉族群的指称[(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十三》，第4885、4887、4891、4892页]，笔者此处根据原文使用，无任何歧视之意。此外，关于湘西地区各郡县与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各郡县户籍人口数量的比较，笔者在拙著《涪沅之间：唐代黔中道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25年)已进行详细论证与比较，此处限于篇幅，不具体引用文献进行论证与说明。
- ⑧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第1346页。元朝廷将唐朝属于羁縻州管辖的很多区域按照内地管理方式纳入了直接管理，在疆域建设与管理上存在明显突破。
- ⑨ 关于元代西南格局与湘西交通关系，可参见谢晓辉《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第三章第一节“新格局的开拓：元朝土司制度的推行以及新路的开辟”。
- ⑩ 温春来、安介生等等相关研究中均指出贵州建省的重要原因是为保障入滇道路的畅通与云南边疆治理(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安介生、姜建国：《明清云贵地区的交通建设及其原因探析》，《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 ⑪ 同治《沅州府志》卷三七《艺文志上》，岳麓书社，2011年，第660页。沅即沅州，治今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
- ⑫ 谢晓辉亦在研究中指出，明代由贵州进入云南的驿道有两条，其中一条即由湖广溯沅水而上，经贵州东至云南，是明朝沟通云南最为重要和便捷的交通要道，其畅通是明朝经营云贵的基础(谢晓辉：《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第74页)。
- ⑬ (明)万表编：《皇明经济文录》卷三一《贵州》，辽海出版社，2009年，第636页。括号内为原注，根据注释及区域政区建置，笔者认为引文原注中“镇远”应为“镇溪”，“酉阳宣抚司”应为“酉阳宣抚司”。
- ⑭ 关于湘西重要战略地位及湘西军事建设与西南战略的关系，谢晓辉亦在已有研究中指出，明朝花重金在湘西修建哨堡、边墙的关键原因在于保持控制西南命脉的云贵大道的畅通(谢晓辉：《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第99—100页)。

参考文献：

- [1] 叶德政. “镇筸”考辨[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 14(4): 84-86.
- [2] 司马迁. 史记[M]. 2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3] 范曄. 后汉书[M]. 李贤, 等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831.
- [4]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贺次君,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735.
- [5] 魏征, 等.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890.
- [6] 刘昫, 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7]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8] 周妮. 明清时期“苗疆”土司与“流官”政区疆界纷争与化解: 以黔楚蜀交界地区为例[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9, 29(3): 115-123, 216.
- [9] 曾公亮. 武经总要前集[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1219.
- [10] 彭百川. 太平治迹统类[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408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1]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4179.
- [12] 周妮. 山川纵横: 宋至清时期湘鄂山区政区与军事地理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 [13] 茅元仪. 武备志: 卷194[M]. 明天启刻本.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 [14] 严如煜. 苗防备览[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3: 684-685.
- [15] 薛刚, 等. 湖广图经志书[M]//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1460.
- [16] 李贤, 等. 大明一统志[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7.
- [17] 明太祖实录[M]. 上海: 上海书店, 2015.
- [18] 明太宗实录[M]. 上海: 上海书店, 2015.
- [19] 明宣宗实录[M]. 上海: 上海书店, 2015.
- [20] 明武宗实录[M]. 上海: 上海书店, 2015.
- [21] 敖宗庆. 副长官李公盘死节传. 乾隆贵州通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 第5册,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166.
- [22] 罗洪先. 念庵文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275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487.
- [23] 周妮. 政区与区域之间: “黔中”名实变迁考[J]. 贵州文史丛刊, 2022(2): 1-24.
- [24] 祝穆. 方輿胜览[M]. 施和金,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25] 黄纯艳. 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J]. 历史研究, 2019(5): 22-40, 189.
- [26] 章潢, 辑. 图书编[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969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7] 陈其猷. 皇明经济文辑[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9: 953.
- [28] 萧端蒙. 问贵州(建总督重臣)[M]// 颜丙震. 明代涉黔奏议辑论.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8: 27.
- [29] 夏燮. 明通鉴[M]. 沈仲九, 标点.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2046.
- [30] 迈柱, 等. 雍正湖广通志[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531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449.
- [31] 明世宗实录[M]. 上海: 上海书店, 2015.
- [32] 明神宗实录[M]. 上海: 上海书店, 2015.
- [33] 陈仁锡. 八编类纂[M]// 续修四库全书: 第1245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298.
- [34] 张英, 等. 御定渊鉴类函[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984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781.
- [35] 官修. 钦定历代职官表[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602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172.
- [36] 靳润成. 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6: 132.
- [37] 席绍葆, 谢鸣谦, 等. 乾隆辰州府志[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 [38] 张官五, 吴嗣仲, 等. 同治沅州府志[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 [39] 刘臬. 新建五寨城记[M]// 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 第72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13: 316.

Enhance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Xiangxi under th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of the southwestern border —Centered on “Zhen Gan” in Ming Dynasty

ZHOU Ni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Zhen Gan” is a combination of “Zhen” and “Gan”. Its earliest appearance and use can date back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Zhen Gan’s Guarding and Preparation Ministry in the eighth year of Zhengde. Xiangxi, where Zhen Gan is located, had bee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Qianzhunjun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a key area of contention between the Qin and Chu, and a vital point for the Chu to expand its territory to the west into Yunnan and Guizhou with obvious strategic value of location. In Tang Dynasty, it belonged QianzhongDao, which was an important area connecting the “inner land” and “frontier” (JiannanDao and LingnanDao). In Song Dynasty, Zhen Gan became a dependent region on the border with “provincial land”, where the system of fortress was extensively set up to achieve systematic military management, thus opening a new chapter in regional governance.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y, the establishment of Baojing County and its ministry for both the army and the civilian changed th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f the region, and reached its peak. Particularl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Ming Dynasty’s governance of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Xiangxi, where Zhen Gan is located, became an important passage in connecting the “interior” with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further enhancing its strategic value. To maintain this passage and ensure the supply of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needed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Xiangxi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uthwestern strategy”, with Zhen Gan becoming the “top priority” in regional governance, successively establishing the Zhen Gan’s Guarding and Preparation Ministry and Zhen Gan’s Deputy General. To the Jiajing period, the establishment of Huguang’s Governor-general in Yuanzhou further elevated the level of regional management and defense to the highest level.

Key words: Ming Dynasty; Xiangxi; Zhen Gan; governance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

[编辑: 苏慧]